



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 有关核问题的决策

杨 捷

摘 要: 如何运用核武器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是美国政府在危机决策过程中的重要议题。危机初期,华盛顿当局通过向欧洲派遣具有运载原子弹能力的 B-29 轰炸机实施对苏核威慑;在化解危机的外交行动陷入僵局时,政府内部更是出现了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呼声和争论。这场危机尽管最终以和局收场,但却强化了美国政府以核武器作为对苏威慑工具作用的认知;华盛顿当局的相关核决策,也成为战后美国以“核威慑”为核心的对苏核战略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 第一次柏林危机; 美国; 核威慑; 核打击; 核战略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一直把核武器作为最为有效的国家战略威慑力量,始终把核威慑战略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但在近一段时间,欧美的众多知名政治家、学者和分析家开始认为核威慑已经失去意义,并呼吁大幅削减美国的核武器。与此相对,奥巴马总统在上任后不久,也声称要大幅削减美国的核力量,并于 2009 年 4 月 6 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讲话中甚至主张建立“无核世界”,并因此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学者的倡议和国家领导人的态度,使得有关核威慑战略的讨论再次成为国际政治和美国外交的热点话题,也引发了“是否美国长期坚守的核威慑战略已然过时”的疑问。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和思考,离不开认清美国核威慑战略的由来和实质,而冷战时期恰恰是华盛顿当局形成核威慑战略的关键阶段。从历史角度看,冷战时期美国核威慑战略的形成,是核武器作为“政治武器”在历次重大国际事件中实际运用的产物。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不少论著研究了冷战时期美国核威慑战略的演变,但鲜有针对具体的核威慑案例展开的专门探讨。作为美苏两国在“核时代”展开的首次面对面较量以及早期核威慑思想成功运用的范例。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有关核问题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促使核威慑成为美国核战略核心思想的内在动因,是透视战后美国核威慑战略由来和实质的重要窗口。那么,在这次危机中美国是如何看待和发挥核武器的作用? 政府内部就此产生了怎样的意见分歧? 决策层怎样在不同的立场之间进行政策选择? 这次危机如何影响了美国官方对核武器作用的认识? 危机中的核决策又对冷战时期美国的核战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一、实施对苏核威慑:危机中的首次核决策

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爆发,源于战后初期分区占领德国的状态下,东西方在对德政策上的矛盾冲突。美、英、法三国在冷战背景下单方面组建西德国家并在西占区实施货币改革的做法,与苏联作为回应而采取的封锁西柏林对外交通,并迫使西方撤离的举措形成互

动,最终在1948年6月演化为一场危机对抗。

基于美国在战后初期处于核垄断地位的现实,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在1948年4月向华盛顿当局建议,使用核武器来应对苏联可能在德国向西方施加的压力。尽管该提议在当时遭到了众多美国官员的反对和驳斥,但有关如何在面对苏联反西方行动时发挥核武器作用的讨论,却一直没有脱离美国决策层的视野。其实,早在“杜鲁门主义”出台后不久,美国政府就已开始谋划对苏核威慑的政策,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伊始,美国军方的主流意见也认为必须体现核武器的国防价值,并主张积极发挥“核外交”的作用。他们认为核威慑在理论上可以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是威慑苏联不要让危机升级,警示莫斯科任何造成危机升级的举动都将给其带来“失大于得”的严重后果;二是核压力可能迫使苏联取消柏林封锁甚至完全撤出柏林和东德^①。此外,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代表政府在6月25、26日向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提出的应对危机建议中,除提议密切两国的对策协商和加强空运外,还重点要求美国考虑在欧洲集中空军战略轰炸力量,同时增派具有运载核武器能力的B-29轰炸机^②。美国决策层有关运用核武器的讨论,始于6月27日下午在五角大楼陆军部长罗亚尔办公室召开的国务院和国防部负责人联席会议,与会者在讨论中提出了是否派遣两个B-29轰炸机中队前往英国,并以此为基地对苏实施核威慑的问题^③。

在7月15日的第15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直截了当地指出:派遣B-29轰炸机的好处在于不但可以进一步表明美国的坚定立场,更可以刺激英法两国以使他们不做出更加绥靖的决定。军方代表惠特尼对此表示赞同,并认为此举可以通过在英国本土建立美军轰炸机基地来润滑两国的合作关系。他强调派遣计划目前已经得到了英国内阁的批准,但如果形势继续恶化,美国也许就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副国务卿洛维特则一再表示,让“是否派遣B-29轰炸机”的问题成为争论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不曾对向自己利益攸关的地方派遣武装力量感到过犹豫,正如当初美军进入德国那样。他认为美国完全可以应友邦政府的要求在其国土上建立空军基地,并强调“使用军事训练的借口是一个极为正常的外交惯例”。但在该问题上也有反对的声音,陆军部长罗亚尔就认为,洛维特提出的借口会在对苏谈判中“给美国带来没有诚意的罪名”。在投票表决之后,会议最终建议总统下令向英国派遣B-29轰炸机^④。

马歇尔和福雷斯特在15日的会议结束后前往白宫向总统作汇报。杜鲁门对“派遣B-29轰炸机”的看法与会议结论一致,即利用其可以运载和投放原子弹的特性对苏联实施核威慑。当晚,华盛顿宣布立即派遣B-29轰炸机前往位于英国本土的皇家空军基地。7月17日,美军第28轰炸机大队抵达英国林肯郡斯沃坎普顿;次日,第2轰炸机大队飞抵拉肯希思;8月8日,由第207和第371轰炸机中队混编的第307大队达到马汉。与此同时,华盛顿当局故意对外泄露这种轰炸机具有运载核武器能力的特性,甚至暗示它们载有原子弹。美国《新闻周刊》立即注意到了其中蕴涵的核威慑意味,并指出苏联将要面临的“不仅仅是失败而是完全的毁灭”。一位西方记者曾对此评论说:“这是第一次直接将核武器引入外交和暴力体系,并希望借以规范他人的行为。”^⑤但真实的情况是这些飞机中没有一架能携带原子弹,当时美国空军的武器库中“只有少数几架经过改装的B-29轰炸机能携带原子弹而这几架都没有去英国”^⑥。此举的目的正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盛顿官员所言:“派遣B-29就是希望使人产生这些飞机装备了核武器的印象,这是一种心理战”,其实就是通过核威慑迫使苏联在柏林问题上让步。对此,曾任苏军总参谋部成员的尼古拉·切尔沃夫上将回忆道:“派驻英国的核战略轰炸机一抵达,我就得到了消

①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05页。

②Denis Smyth, Andre Gerolymatos, "Douglas to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25-26 1948,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V, Series F, 1948, Vol. 13*. Bethesda,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2002, p. 143.

③福雷斯特·C.波格:《马歇尔传1945—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10~311页。

④Dennis Merrill, "The Record of 15th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July 15 1948,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 Vol. 16, Cold War Confrontation: Truman, Stalin, and the Berlin Airlift*. Bethesda,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7, pp. 68~74.

⑤理查德·罗兹:《瓶中之蝎:揭开冷战铁幕的权威报告》下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98页。

⑥福雷斯特·C.波格:《马歇尔传1945—1959》,第312页。

息,当时我是总参军事学院的学员,正对美国的核潜力进行评估,尤其是那90架可携带一两枚原子弹的核轰炸机,这意味着美国大约有200枚原子弹,这当然是个严重的威胁,相当于200个广岛呀!”^①可见,由于不清楚美国核力量的真实情况以及调遣轰炸机的内幕,苏联方面在得知消息之初还是颇感压力的。

从危机进程看,美国通过派遣B-29轰炸机实施对苏核威慑的作用具有一定局限性,至少没有达到迫使莫斯科立即放弃对抗政策的效果,之后东西方外交谈判的曲折过程便是证明。不过,事后华盛顿的高官们依然认为,斯大林没有使危机进一步升级就是出于对美国核打击的惧怕^②。

二、对核威慑上升为核打击的否决:危机中的第二次核决策

从1948年8月初到9月中旬,美、英、法三国为化解危机与苏联在莫斯科和柏林展开了多次谈判,但均因双方分歧较大而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通过外交渠道和解危机遭遇挫折之时,美国军方提出了是否需要苏联采取核打击的问题。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早在7月28日与马歇尔、罗亚尔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的一次会谈中,就提出了应就柏林危机考虑动用原子弹攻击苏联^③。由于当时对苏核威慑实施不久且对苏和谈尚未开始,因此该动议没有得到他人的响应。随着对苏交涉僵局的出现,福雷斯特尔有了充分理由说明自身意见的合理性,他甚至在9月13日的白宫高层会议上直接询问总统,是否准备在柏林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其实,福雷斯特尔对苏联人一直心存敌意,因此,他对苏联发动战争可能性的估计要远大于其他官员,他认为与苏联进行核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此时,福雷斯特尔的观点已有了一批知音,比如美国19家报社的负责人于9月14日晚在福雷斯特尔家聚会时曾一致表示:“如果爆发战争,美国人民会认为使用原子弹是理所当然的”^④;国务卿马歇尔和共和党人约翰·杜勒斯也表示“如果不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美国人民会把你处决”;驻德军政官克莱更是声称“应毫不犹豫地使用原子弹”,并扬言“要首先用它来袭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⑤。国家安全委员会也表示:一旦发生冲突,将根据国家安全利益迅速使用所有可能的解决办法,包括使用原子弹^⑥。

不过,使用原子弹的最终决定权属于总统,杜鲁门的态度至关重要。福雷斯特尔曾多次劝说总统将核武器的控制权转交给军方,并希望他当机立断^⑦。对此,杜鲁门曾在一份备忘录中表示,自己很担心军方人士真的会要求使用原子弹攻击苏联,并强调“战争离我们近在咫尺,而我完全不希望这成为事实”^⑧。在上述思想驱使下,杜鲁门始终将核武器的使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整个柏林封锁期间,他顶住来自军方强硬派的压力是与其“文官治国、总统掌握最终军事决定权”的理念密切相关的。杜鲁门非常强调,“只有总统才有权决定应该制造何种武器,才能决定是否可以为了试验的目的而爆炸一种武器,才能决定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可以运送或储备核武器。”^⑨自二战结束以来,杜鲁门一直在使用原子弹问题上保持谨慎态度,他坚持不让军方负责监管核武器。正如他在柏林危机高度紧张时对陆军部长罗亚尔说的:“你必须理解原子弹不是一件单纯意义上的武器”,“它可以被用以消灭妇女、儿童和手无寸铁的平民,但这些却都不是武器的真正用途……因此希望你理解,我必须考虑到原子弹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现在并不是卖弄它的时候。”^⑩

当然,总统的立场只是决定美国没有对苏采取核打击的原因之一,以下因素同样制约着华盛顿的决策。

首先,核武器的自身局限性以及东西方在德国常规驻军的实力差距,使美国不敢贸然行动。当时美国的核武器数量极为有限,尽管从1947年6月到1948年6月,美国储存的原子弹已经从13枚增加到

① 约翰·纽豪斯:《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19页。

② 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106页。

③ Avi Shlai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 A Study in Crisis Decision-making*, p. 337.

④ Walter Millis. *The Forrestal Diarie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51, pp. 456~458.

⑤ Walter Millis. *The Forrestal Diaries*, pp. 438~439.

⑥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September 10 194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Vol. 1*.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pp. 624~628.

⑦ Walter Millis. *The Forrestal Diaries*, p. 490.

⑧ 李胜凯:《希望与恐惧:杜鲁门时期美国原子外交研究 1945-1953》,南开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49页。

⑨ 李胜凯:《希望与恐惧:杜鲁门时期美国原子外交研究 1945-1953》,第150页。

⑩ 理查德·罗兹:《瓶中之蝎:揭开冷战铁幕的权威报告》下卷,第399~400页。

50枚,但对于幅员辽阔、战略纵深较大的苏联来说,即便用尽所有的库存原子弹也不足以对其造成致命的打击效果。此外,当时运载和投放核武器的工具主要是B-29轰炸机,这种型号的飞机双程飞行距离有限,无法取得预期的军事效果,而新制造的B-47轰炸机尽管飞行距离远但数量有限,无法承担大规模核打击的任务^①。因此,“一旦美国的核打击无法对苏造成致命伤,苏联则有了挑起战争的好机会,他们将利用自身在德国和东欧地区的常规军力优势一举击败西方”^②。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当时的报告:美国驻扎在德国和奥地利的陆军共计90821人,驻扎欧洲的空军18443人,各类飞机总计不足400架;英国陆军在德国和奥地利驻有包括4个师、3个独立旅和4个独立步兵营在内的103426人;驻扎德国的皇家空军有4个轻型轰炸机中队和6个战斗机中队共计11470人;法国在德国和奥地利只驻有75000人的陆军部队;相比之下,苏联在德国和奥地利境内则驻有23个陆军师共计348000人,以及包括699架战斗机、480架轰炸机和240架地面攻击机在内的庞大武装力量^③。上述常规武装力量对比的差距,是华盛顿在决策核打击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其次,盟国尤其是英国政府对核打击的态度,不利于美国对苏动用原子弹。早在1945年11月,伦敦当局就在一份名为《英国当前核政策》的备忘录中,对使用核武器击败苏联提出了两个必要条件:1、拥有大量可供使用的原子弹成品(大约1000枚左右);2、西方拥有可以派出直飞轰炸机,摧毁乌拉尔以东和以西的苏联城市和工厂的空军基地。该备忘录的结论是,“在今后5年内,希望单纯使用原子弹击败苏联是不现实的”^④。

再者,对所要维护的利益目标与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之间的价值对比,不倾向于对苏实施核打击。杜鲁门政府在二战末期使用原子弹攻击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是第一次柏林危机前美国对他国采取的唯一一次核打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华盛顿动用原子弹的主要目的是尽快结束战争、减少美军伤亡,同时也含有为“珍珠港事件”雪耻的意味。但是,战后美国在运用核武器处理对苏关系时所面临的问题,却与战时的对日作战大相径庭。战后初期,美国采取对苏强硬政策是有限度的,遏制苏联的目的是为了维系雅尔塔体系所形成的战后国际关系格局以及自身的既得利益,美国内部对为了坚守西柏林而主动挑起战争存在争议。包括驻苏大使史密斯在内的诸多政界要员都认为,应继续通过对苏谈判实现危机的和解;而以陆军部长罗亚尔为代表的许多军方高级将领也都心存厌战之意。同时,作为表达公众意愿的重要渠道,美国国内部分有影响的报刊也认为:“美国对西柏林的占领地位,不值得通过冒战争的风险来维护”,这些报刊甚至暗示“如果替代谈判的方法是使用武力的话,就应该撤出西柏林”^⑤。

可以说,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确立的对苏核威慑方略但不上升为核打击政策,主要是源于冷战决策困境的制约。在冷战境遇下,美国的对外决策有着自认为必须遵从的两大行为准则:一是阻止苏联势力蔓延,二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对第一次柏林危机来说,在东西方核心利益地区——德国的军事挑衅所导致的危机对抗,在走向上具有较大的不可预测性,从而极大提升了彼此走向战争的潜在可能性。美国政府希望利用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迫使苏联放弃可能的战争企图,但也要顾及实际使用该武器可能引发的冲突。所以,杜鲁门尽管在化解危机的对苏交涉过程中,时常将苏联政府称作是“冥顽不灵的和可疑的极权政府”^⑥,但他仍不愿通过兵戎相见的方式解决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另一次战争的那种愚蠢的和悲剧性的后果将形成一次民族的自杀行为”^⑦。因此,“威胁使用但不实际使用”的思想,便成了美国运用核武器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指导原则,而华盛顿当局最终也是通过外交途径而非依靠

① Lawrence Aronse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British and Canadian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1941-1948*.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p. 71.

② 戴超武:《原子弹与战后初期美国对苏核战争的设计》,载《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③ “Berlin Airlift and Defense”, *Record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Part II 1946-1953 Strategic Issues: Section I*, JCS 1907/1, pp. 26~27. (缩微胶片,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胶片阅览室)

④ Magaret Gowing & Lorna Arnold. *Independence and Deterrence: 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 1945-1952*.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4, pp. 199~200.

⑤ Dennis Merrill. “Presidential Memorandum”, September 1948,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 Vol. 16, Cold War Confrontation: Truman, Stalin, and the Berlin Airlift*, pp. 105~107.

⑥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1974年,第252页。

⑦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255页。

对苏核打击,化解了可能导致战争的第一次柏林危机。

三、危机中的核决策对美国核战略的影响

美国学者沃捷特克·马斯特尼认为,冷战在刚开始时是一种政治冲突,但 1948 年柏林危机后便发生了质变,因为苏联的行动有触发军事冲突的危险,导致华盛顿认为莫斯科的威胁是潜在的军事威胁,因此逐渐更多地从军事角度看待相互关系^①。从 1946 到 1948 年初,美国决策者主要关注的是苏联通过武装侵略以外的其它方式进行扩张^②。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前,美国政界和军界普遍认为:苏联扩张给欧洲带来的潜在危险及其给美国造成的安全压力,仅限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至少在短期内苏联不会对欧洲发动侵略战争^③。但随着柏林封锁事件的发生,美国政府的思维出现了拐点,他们认为需要面对由于克里姆林宫决策失误或东西方争端失控而导致战争的危险^④。其间,美国决策层中的主导观念是:如果说苏联在 1948 年初制造“捷克二月事件”是以政治渗透方式在东欧的公然扩张,那么它实施柏林封锁逼迫美英法军队撤离的行为则是公开的军事挑衅^⑤。

这场危机为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和反共势力实施更加强硬的对苏政策提供了借口,突出了军事力量作为推行遏制政策工具的重要性,更是改变了政府决策者对使用核武器作为威慑工具的认识。虽然美国在战后初期长时间保持着对苏战略力量的优势,但在 1948 年之前却很少注意到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所应扮演的重要角色,政府依然认为必须将发展重点放在常规武装方面。杜鲁门曾几乎在危机发生的同时表示:即便是爆发战争,也只是在常规军事争斗面对迫在眉睫的失败时,美国才会将核武器作为最后一招加以使用。政府内部负责国家安全政策制订的官员们同样认为,可能再次爆发的战争依然属于常规武器对抗的范畴,国家安全资源局和军需部都因此将对普通战争动员计划的执行放到了优先地位^⑥。但情况在危机爆发三个月后发生了变化,随着以向欧洲派遣具有核打击能力的轰炸机为途径的对苏核威慑行动的实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出台文件强调:绝对不能让苏联人感到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他们使用核武器,因为一旦莫斯科的当权者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他们就会主动挑起那些恰恰是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阻止的侵略活动。国安会在这份编号为 NSC-30 的《美国核武器政策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核威慑思想。报告还指出:一旦出现敌对行为而这种行为又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军方就必须迅速且有效地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可能的手段^⑦。在该文件精神指导下,美国政府不断夯实核威慑的物质基础,在继续加快核武器生产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可以携带和投放核武器的轰炸机群数量,其飞行范围则扩大到了可以对苏联形成包围态势的海外美军基地网^⑧。到 1948 年底,美国拥有核运载能力的各种型号轰炸机的数量有了大幅增加,至少包括 18 架 B-50 型轰炸机和 4 架 B-36 型轰炸机,B-29 型轰炸机的数量也达到了 1947 年底的 3 倍^⑨。尽管战后美国核战略的发展在整个 40 年代后期尚处于初始状态,但这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影响下出台的有关使用核武器的 NSC-30 号文件,却着实成为了美国以“核威慑”为核心的对苏核战略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客观地说,当美军在 1945 年 8 月将仅有的两颗原子弹投向日本时,美国政府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核战略,只是在苏联也拥有核武器之后,在相关竞争的基础上,核武器才被政府置于战略高度,确立了新

① 沃捷特克·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60 页。

② Lawrence Aronse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British and Canadian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1941-1948*, p. 70.

③ 许海云:《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 1945-195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第 317 页。

④ Lawrence Aronse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British and Canadian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1941-1948*, p. 70.

⑤ 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 84 页。

⑥ Lawrence Aronse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British and Canadian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1941-1948*, pp. 70-71.

⑦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September 10 194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Vol. 1, pp. 624-628.

⑧ Melvyn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25-226.

⑨ 刘金质:《冷战史》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第 46 页。

形式的战略——核战略^①。尽管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原子弹问世前就曾预言,该武器将会成为抗衡苏联军队的一个军事砝码,并能够帮助美国实现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但华盛顿的决策者在二战末期首次使用它时,还是更多地为了让这种新式武器体现它的军事价值。随着美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以及冷战的爆发,核武器才逐渐超出了一般军事武器的功能范畴,成为美国外交领域至关重要的“政治武器”。在苏联于1949年8月成功爆炸第一枚原子弹前,美国一直处于单独垄断核武器的地位,但其间华盛顿的核战略还远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亨利·基辛格曾指出:美国当时主要是从用数量不多的原子弹对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讹诈的角度,来制订核作战计划和部署核武器的。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有关核问题的决策状态,与基辛格所言大体吻合。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华盛顿决策层而言,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相关核决策及其对危机的化解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说明核武器是对苏冷战的有力工具,是其实施威慑的有效手段。因此,核武器在这次危机中的运用,为美国形成以“威慑”为核心的对苏核战略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这一范例的影响,并没有因为苏联在危机结束后不久也开始拥有核武器而褪去,反而坚定地促使华盛顿决策层构建更加成熟的核威慑战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50年初出台的NSC-68号文件便是证明。这份美国冷战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在总结以第一次柏林危机为代表的战后苏联一系列对外活动的基础上,指出美国正面临着共产主义思想与苏联的国家力量相结合而形成的一场侵略扩张活动的威胁,华盛顿必须用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一切力量与之对抗,为此需要特别加大扩充自身的核力量,如此便可无须战争即可遏制苏联,甚至迫使其改变苏维埃制度^②。NSC-68号文件主张要拥有威慑性的核报复能力,必须增加核武器的储备、强化核报复力量的战争状态,以有效地抵销苏联核技术的发展及常规力量的优势,借用军事实力假止战争,从而达成自身的政策目标^③。由此,美国正式确立了以“核威慑”为核心的对苏核战略。不难发现,NSC-68号文件中对核威慑战略主旨的表述,其实与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所遵循的“威胁使用但不实际使用”的核决策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是对危机境遇下制订的NSC-30号文件——《美国核武器政策报告》思维的延续和深化。

四、结 语

综观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有关核问题的决策,华盛顿当局的核心理念是确立对苏核威慑方略但不上升为核打击政策,有人称之为核讹诈,但更多的学者把这种政策理念理解为美国成熟的核战略的萌芽。的确,虽然美国在自身的核垄断地位被打破后,依据形势的演变,相继实施了包括“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现实威慑战略”、“星球大战战略”在内一系列具体核战略,但其基本内涵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这些不同阶段的核战略方案,与杜鲁门政府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核决策思维一样,都将核武器作为实现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倚重力量,均试图通过核威慑,让苏联确信它的某种行动所产生的后果将使它无法承受,通过这种方式使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不敢采取这种行动。冷战结束后,美国核武器的对苏威慑作用基本消失,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核武器仍是美国战略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然是慑止外部势力对自身安全利益侵犯的重要手段,只不过威慑的目标变成了继承苏联大部分政治和军事遗产的俄罗斯、以及其它可能对美国发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的政治实体。因此,从政策理念的来源上说,华盛顿决策层在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中对核武器威慑功能的运用,为之后历届美国政府的核战略思维树立了标杆。

● 作者简介:杨捷,南昌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江西 南昌 330031。

●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10LS16);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LS1112)

● 责任编辑:桂莉

① 潘锐:《“从大规模报复”到“星球大战”——论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的演变》,载《太平洋学报》2002年第3期。

② 潘锐:《“从大规模报复”到“星球大战”——论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的演变》。

③ 参见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附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